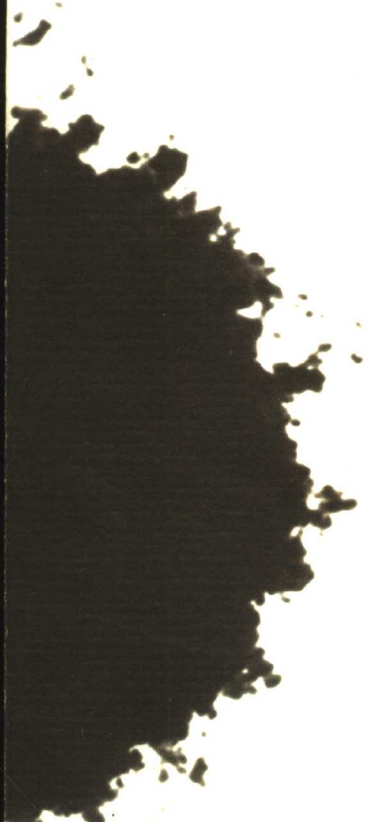




王曙光 著 Wang Shuguang

Sociological Findings of HIV in China
Vulnerability in Subcultural Contexts & Appropriate
Strategies in Intervention

艾滋病

的社会学发现
亚文化易感与适宜干预策略

艾滋病的 社会学发现

亚文化易感与适宜干预策略

Vulnerability in Subcultural Contexts
& Appropriate Strategies in Intervention

王 曙 光 *WangShuguang* 著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艾滋病的社会学发现:亚文化易感与适宜干预策略/
王曙光著.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8
ISBN 7-5364-5761-8

I. 艾... II. 王... III. 艾滋病-社会学-研究
IV. R5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597 号

艾滋病的社会学发现

亚文化易感与适宜干预策略

著 者 王曙光
责任编辑 宋小蓉
封面设计 李 庆
版面设计 康永光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 610012
成品尺寸 241mm×167mm
印张 21.5 字数 360 千 插页 4
印 刷 四川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5 年 8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55.00 元
ISBN 7-5364-5761-8/C·54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邮购组联系。

地址/成都盐道街3号
邮政编码/610012

致 谢

首先我应诚挚地感谢四川恩威抗艾滋病中药(乾坤宁)开发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主任、恩威集团公司总裁薛永新先生为本书出版提供的慷慨支持。薛永新先生投入多达 5000 万元用于率先开发中国第一代抗艾滋病中药制剂。他作为我国中药抗艾滋病最前沿传统医学科学家和中国民营企业家,其人文品德和奉献精神令人敬佩,也正是由于他的支持,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

书中陈述的课题研究大多为国际基金会资助项目,这些国际基金会包括了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络组织,英国艾滋病教育与研究基金会,澳大利亚健康与医学研究会,澳大利亚 Keats 跨文化心理学研究基金会,澳大利亚艾滋病组织联盟,中-英艾滋病预防合作项目基金及欧洲前景集团。我以真诚的感激心情由衷地感谢他们对于我工作的有力支持。

还要真诚地感谢曾经参与和支持我从事的这些课题的同行,感谢那些曾与我一道进入各种社区、接近各类人群的课题组成员和志愿者。

全稿完成于 2005 年春节期间,对于我的亲人的全力支持永存感激之情。

最后,感谢为我们的研究发现贡献了访谈数据的所有参与者,并将此书献给他们所代表的因社会因素的易感而面临艾滋病打击的所有脆弱人群。

作者

2005 年初春于雅安

导 言

个人的遭遇乃是社会的构成,个人对于艾滋病的易感是集体的、历史的结构在特定社会的制度、阶级、文化体系中,这是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对于艾滋病时代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基本理解。的确,艾滋病的流行与控制已远远超出了健康与疾病的医学范畴,而更为深入地涉及到人类生存社会环境的所有方面。在发达国家,社会学对于人群艾滋病易感风险行为是作为人群社会生活在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表征,并被看作是存在于易感行为实践中的阶级、制度和观念的复杂构成,是群体社会生活实践在个体行动符号上的表达的历史制定,是个体遭遇的社会的和历史的的不幸。由此需要从专注于不当个人行为 and 死亡表征的理解转向艾滋病时代的脆弱人群权益、平等、生存关怀的关心,从而体现了更多的人文关怀和社会批判的含义,而在发展中世界,尽管其病毒传播与流行的模式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各有所不同,但人群在社会经济上的贫困脆弱,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和观念形态的不平等与歧视性,主流社会排斥和忽略的边缘状态,权利的丧失及健康服务资源分配的不公平等社会因素,则是这些群体集体暴露于艾滋病流行和潜在遭受其打击的症结所在。同样,对于这些因素的减少或消除是艾滋病危机能够得以根本扭转的关键。很显然,艾滋病典型地突出了人类疾病与健康构成的社会本质。作为生物医学现象的社会存在,人群对于艾滋病病毒的易感差异是非生物学的结构在他们所处文化和社会制度中不同阶级、经济地位、职业背景、资源利用、亚群体和历史动态中,而普遍存在于某些人群中的毒品使用、地下血供和多性伴无保护性实践等高风险行为,其本质在于所处这些亚群体问题生活方式最为直接的经济生活、制度条件、世俗观念的偏见、歧视和不平等的社会历史构成。

同时,艾滋病之所以比任何其他的疾病与健康问题的社会研究更具有挑战性,这不仅在于 20 年来艾滋病的全球性流行冲击和改变了人们社会经济生活、观念、行为方式、习俗、制度建构以及世界范围的对应策略的制定方式,而且对于以往疾病单纯的生

艾滋病的社会学发现

物医学、公共卫生和心理学传统应对模式和个体意义上的行为改变策略给予根本性地挑战,这就迫使人们意识到,对于艾滋病易感的风险性行为的认识必须超越医学、流行病学及普通社会调查与干预研究的模式,进而探讨人群艾滋病易感行为的文化隐喻、社会构成、阶级维度、历史的动态、亚文化变量及话语、符号、权力网络的因素。这也就意味着,抗击艾滋病从根本上是抗击存在于一切社会中政治经济生活、阶层制度和习俗观念中各种不平等的人类文明社会促进运动,而由抗击疾病流行所引导的世界范围的制度文明促进,是在过去的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尤其在后现代社会和受后现代主义批判精神影响的世界,这种以非激烈的和微观社会体制权力转移的社会促进运动的特别方式,无疑强劲地推进了社会学对于人类疾病社会本质含义的理解,与此同时,抗击艾滋病引导的制度性的全球文明进程的静谧变革,使得社会学必然担负起艾滋病时代社会理论与实践最前沿的特殊角色。为此,社会学必须以更为严谨、科学和经验实证方式(empirically-based approach),对于存在于不同群体艾滋病易感的社会构成因素予以鉴别、解释和评估,以社会学的方式辨析人群疾病易感的性实践,性表达及其观念习俗,道德禁忌,制度歧视,强权排斥,认同障碍,世俗偏见——所有这些观念,符号,隐喻,表征,剧目背后的制度,阶级,历史的构成,由此为发展更为有效的文化适宜对应策略提供广泛的直接依据。

健康与疾病行为的社会本质问题在早期的 Durkheim, Marx, Veber, Parsons, Freud 行为结构和功能主义理论中已有了广泛的探讨,并开创了对于疾病与健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构成的系统理解构架。随后的 Marcuse (1955, 1961); Malinowski (1960); Mead (1949); Horheimer (1978); Gagnon & Simon (1973); Goffman (1963); Rubin (1975); Foucault (1980, 1983); Seidman (1996) 时代一大批创新理论的出现——符号象征理论,互动理论,现象学,民族志和批判评价鉴别理论,构造主义,建构理论,后现代主义以及酷儿理论(Queer theory/sociology)解构批判主义等已开始突破性地检讨和探索行为的社会制度表达和文化隐喻的社会存在本质问题,并在通过考察性实践在边缘人群社会生活的历史和权力制约的制度建立过程,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人们行为在历史、权力、阶级和制度范畴中建构的事实,而当今的社会学家和艾滋病社会理论学家如 Rogers (1982); Herdt (1991); Manuel (1991); Connell & Dowsett (1992); Seidman (1997); Griffin (1999); Helman (1990); Parker (1991); DiClemente (1994);

Sociological Findings of HIV in China

中国艾滋病社会学研究的社会学发现

Aggleton (1997); Brunt (1997); Tufte (2001); Kippax (2002) 等则在艾滋病社会理论的实践中多样化地发展和超越着过去的理论范式,尤其是不同于法国纯哲学思辨式的社会学。正是旨在理解、辨析、阐释和策略抗击艾滋病的具体社会与文化实践中,新一代社会学理论有着强烈的植根于现实问题、混合定性与量化工作的科学风格。他们创新而极具有操作和运用特质的理论模式可以广泛地见诸于扩散理论(Diffusion of innovations),混合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阶段改变模式(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change and HIV prevention) 社会表征理论(Social representations),跨文化理论,性的社会建构理论,结构-环境改变理论,参与式交流理论,社会生态促进论以及社会运动理论等。这些新一代社会学持续不懈的努力大大推进了行为建构的多样性问题的理解和实践解决方案的发展,由此更为科学实证并清楚地看到人类艾滋病易感行为的历史和社会制度环境的动态。

人类应对艾滋病挑战的历程毫无疑问又会以不同文化实践的方式精炼和深化着社会学关于疾病行为的社会构成的思想。中国艾滋病社会学研究无疑在这个历程中提供着本土文化研究实践的显著贡献,尤如 K·马克思, E·迪尔凯姆, M·道格拉斯, D·哈贝巴斯和 M·福科从一件文化实践的符号象征——一件商品,一双非洲利利部落传统工艺的草鞋及其在屋里摆放的方式,一叠精神科档案卷宗频繁使用的专业术语/话语——所揭示出掩盖在一种文化中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全部奥秘一样,中国社会学亦相信,植根于这个丰富和多样化社会中,任何独立社区与人群性实践的社会动态解析和发现,同样深刻地隐喻着普遍性的社会学价值。

本书探讨的艾滋病社会学——是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实证(empirical)研究,即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实践和证据基础上的观点。书中包括了从1993~2004年间进行的有关中国人群艾滋病社会易感行为评估和行为改变的十多项国际基金资助项目课题研究。这些课题研究的社会学工作,我们将其概括为“艾滋病易感行为多维度亚文化构成社会学系列研究”和“社会学证据基础上的适宜干预策略系列研究”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包含了从寻证评估到有效干预的连贯分析。课题的评估研究旨在针对四川部分区域、社区人群中性病艾滋病易感性行为的社会学评估工作,并通过深入理解人群性病艾滋病易感的多样化具体的亚群体社会构成方式,进而在目标人群中为建立

群体亚文化适宜的干预防治策略提供行为评估可靠的社会学证据,而这些系列研究中,有关人群艾滋病高危或安全性实践的多样性社会和文化的构成方式及其在中国背景下的特点,则是该书力求揭示的社会学问题,即在证据基础上阐明,人们对于性传播疾病易感,绝非单纯个体行为(知识、观念、道德)的因素,而是集体机缘性地结构在多样化隐秘的社会构成中,即构成人群易感的历史动态、阶级构建、文化范式、权力维度、话语制约、亚文化网络以及性别角色身份等,同时量化的证据表明,通过促进社区环境和亚文化改变,社会学多维度的亚文化改变理念可以获得比其他行为改变理论更为持续的效果,这正是本书力求推动和贡献的学术工作。这个以疾病及其对应策略发展为对象的社会学研究中的开拓与发现,对于中国社会学在艾滋病及其疾病与健康的社会研究的原创性价值和前沿意义可以总结为:①探讨了中国社会环境下公众健康宣传难于进入许多亚文化群体去有效地改变他们的高危行为的亚文化信息环节的原因;②揭示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上相同人群中事实存在着不同质的亚群体多样化性实践。理论上说明了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背景因素只有具体结合在阶级、制度、体制、社区、文化等多维度层面亚群体活动多样化机缘结构变量的理解中才有意义。实践上也进而隐含了干预策略的多样化社会建构本质,即亚群体多样性社会环境构成存在的针对性和适宜性;③由此特别强调了干预需要超越目前普遍采用的“学习认知”、“健康信念”、“原因行动”、“信息扩散”和“阶段转换”等个体行为改变的理论而采取亚文化改变的社会促进模式;④干预因此也需要超越以人际交流理论为基础的单纯“同伴教育”的简单方式,而采用动员广泛社会参与的亚文化社会促进的策略。

正是由于书中的研究聚焦于艾滋病易感性实践的亚文化环境范畴维度,因而理论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调查研究。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蔓延虽然确实使性病、艾滋病的社会行为范畴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有关高危性行为的社会学实际评估和证据基础上的干预项目发展工作尚不充分。一个普遍的现象是,许多从事艾滋病干预项目的人,往往把社区健康工作者的一般性地社会调查和健康教育方式简单地理解为社会学的方法,因而在其项目报告中,尤其是称之为采用社会学方法的项目报告中,除了流行病学行为监测数据、人群的人口统计社会背景特征资料及个体基础上的人群健康教育活动的陈述而外,事实上看不出项目设计、实施、评估的社会学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和基础。这即意味着,大量的工作仅仅只是限于停留在人群风险行为频率和人群

Social Findings of HIV in China

中国艾滋病社会背景因素研究

易感知因素的一般性描述上,而无法从根本上以实证的方式对于人群易感行为的社会构成的因素和动态予以揭示,尤其是群体活动对主渠道制度话语的解构和亚文化的重构的机会变量更是缺乏理解。

事实上我们知道,一般性社会调查中关于风险行为的频率及其相关的人口统计变量社会背景因素的资料,并不能自然地带人“群体不同行为实践的历史、社会、文化和亚文化动态的多样化模型”去分析和考察,特别是建立在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资料基础上,普通的社会调查和社会流行病学所获得的人群高风险性行为的信息,通常在方法论上是个体意义上的和以个人行为为基础的,而缺乏对复杂多样化性实践在阶级、种族、文化、制度的具体亚文化形态构成的群体活动的理解,因为人口统计变量划分的人群,通常只是社会人口变量中的年龄、性别、婚姻、教育、职业等社会背景变量分组中的个体成员的统计集合,而并不必然是有着内在社会互动联系的社会(阶级、制度、种族、网络和亚文化)群体,这种方法论基础上的高危人群及其风险性行为的相关因素的评估,不仅存在明显的信度和效度问题,而且缺乏展示人群作为特定的社会存在和建构的重要信息。事实上,即使是人群中的某些群体,在性实践上显示了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的相似性和共同性,他们也未必是有着内在联系的同质社会群体,这即是说,行为的人口统计特征和相似性的人群组中的众多个体间并不必然存在互动的文化、阶级、话语、网络的基础。这也即意味着,由于一般性地社会调查研究,包括公共卫生、健康教育、流行病学、健康心理学等,这些以个体为基础上的人群疾病行为的社会人口变量的研究,并不能对多样化行为的具体社会构成的阶级、制度、亚文化的变量给予实证科学上的量化方式的充分鉴别解释,因而不缺乏建立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基础上的项目”功能,而且对于推动这个领域的人群健康实践的集体行动及其在理论的进程尤其困难。这方面,迪尔凯姆自杀行为的实证研究很早就为我们作出了卓越的示范。他在指出了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以及其他如心理、季节和宗教等因素与自杀行为虚假表面联系的同时,实证地揭示了自杀不过是特定人群集体地阶级构成和社会动态中的个人行为表达。阶级的和群体的社会行动因素绝对地跨越了简单的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和其他个人心理和行为的因素,是社会学从不含糊的态度。即使是由人类基因物质基础上的大脑神经模式和内分泌系统支配下的行为表达趋势,亦会结构在人群不同的阶级、历史、制度生活的实践和经验中,正如情绪、心情、感知、体验和心态

有人群相似性的生物学基础,但却会因人群阶级、亚文化群体的经验和历史过程再构群体间不同的心理、思想和理念的表达方式和频率。群体的社会生活实践再构了他们共同的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虽然性行为、性实践频率的描述、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的相关分析及文学和文献分析式的个案和统计资料,这些或许有助于建立健康意识的公众宣传教育活动促进,但世界范围经验显示,缺乏社会学证据的干预项目和没有人群社会差异针对性的信息扩散策略对于可持续的行为改变没有特别的意义。

本书突出地强调了性实践的亚文化群体构成的社会学立场,这是因为我们的相关研究证实,决定个人不安全行为的因素(动机、规范、价值、态度、意向、目标以及情感、快乐体验)是由生活在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群体的建构,换句话说,社会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影响个人的生活实践,而是具体地以阶级、阶层、社区、职业、种族文化、朋友网络以及角色身份的最直接方式建构起个人行为的群体模式。个人的易感性行为是集体地结构在他所属人群生活的制度范畴、职业阶层、性别角色、社区、种族和地域背景的亚文化范畴中,因此,个人的行为也即体现为人群在特定历史中不同阶级、制度和权力网络的建构。由于历史、阶级、制度对于处于不同阶层亚文化人群在体制、权益、资源的受益是以不同的制度和政策加以划分,这也正是人们行为广泛的群体性差异的社会基础,而个人作为亚文化群体具体活动的存在,其行为方式和社会实践必然是历史的、阶级的和集体的制定,其性病艾滋病易感风险行为,必然也是由他所属群体的制度受益位置所决定。更确切地讲,是制度背后的阶级、权力、身份、世俗的制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艾滋病总是打击农村贫困背景的流动农民工、性工作者、地下血站的献血者和毒品使用者。这些人中个人的易感和被感染的遭遇,根本在于他们隶属的群体所处在教育机会、就业制度、资源分配、话语表达权力和社会支持的弱势边缘地位,使其在人群特定的亚文化活动中对于病毒的感染显示出更大的机缘性和脆弱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美发达国家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中,同性恋人群中的艾滋病流行,事实上更主要发生于那些存在于工人阶级社区,因惧怕世俗观念打击而不认为自己是同性恋身份,拒绝加入同性恋社群,而又从事着男-男性行为的人群。由于人群的亚文化存在是多样性地结构在社会阶级、阶层、职业、种族文化的范畴和动态中,因此,个人对于社会适应脆弱的亚群体介入、参与和所属都必然高度机缘性建构自身人群艾滋病易感的社会境遇,这因而也就成为我们理解和解析人群易感性行为不同社会维度构成

Sociological Findings of HIV in China

中国艾滋病社会学研究

的方法、尺度和契机。在我们的研究看来,雅安三轮车工人,石棉县彝族人群、阿坝藏区的藏族人群,成都市区个体从业人员和从事商业性行为的男-男性关系人群中的“小弟”, (Mb) 及发廊小姐,四川资中县的艾滋病感染者和易感的农民等不同人群,对于艾滋病的观念和易感行为上的差异,并非简单地表现为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因素的制定,而是具体建构在人群每天生活的直接的人际亚文化环境中。换句话说,这些人群中的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特征,如年龄、性别、教育、居住地、收入、职业等社会背景因素并不能简单地解释相似背景人群易感的差异,而只有放在人群多维度的机缘性亚文化具体环境中的解释才更为接近实际和更有意义。

我们强调个人行为的多元化的亚文化建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人群对于他们存在的亚文化环境的互动与再创造的过程。这是一个制度性话语权控制垄断被亚群体解构和再构的亚文化实践过程,其本身体现了人群与社会环境互动关系作用于阶级与历史背景潜移的群体实践过程。我们的研究注意到,个人的行动在他们的环境虽体现为亚文化境遇中的身份、制度、阶级、权力、网络和话语的建构,但却远不是群体环境的被动适应者。个人所在的亚群体始终处于集体应对外界信息的“符号再造”和“自我整合”过程中。对于不熟悉的事物和有威胁性的信息,亚文化中的个体倾向于以群体内互为支持、妥协、认可的集体方式去做出符合人群即成观念图式、生活习俗、目标价值的解释和行动选择,这就使得媒体的公众信息在人群中的反应变得多样化和纷繁复杂。在许多情况下,结果便是不同人群的行为表达与公众信息往往具有广泛的不一致性。显然,这个自 Durkheim 和 Moscovici 以来就使用的社会学概念至今仍然适用。我们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个体从业人员调查中得到的关于艾滋病是“同性恋的病”,“高级性病”,“有钱人的病”的理解,正是他们的亚文化对于含混不清的媒体信息加工的结果。与此同时,亚文化不可取代的“自我整合”功能却又是促进其正面发展最直接和最现成的文化资源。强调行为的制度、职业、种族、性别角色亚文化的构成,在我们的干预研究中则体现为促进人群对于他们安全亚文化的发展和再构。这是行为改变的关键,也是可持续性的基础。我们的研究相信,没有以亚文化改变和促进为基础的干预,是不能真正将健康教育传达到目标人群的亚文化群体中。这个无形群体人际空间决定着是否对于信息的采纳和持久的行为实践。

正因对于蕴含在亚文化群体中阶级、职业、性别、角色、身份和种族这些具有广泛维度和变量的机缘性结构的进一步揭示,其隐含和酝酿的观点无疑与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研究潮流中的构造主义(Constructionist),解构的架构理论(Deconstructionist framing theory),后现代结构主义理论(Post-structuralist)的观点明显不认同。我们的研究对于个体行为的多维度、多样性、多边缘性亚文化群体机缘性构成这一普遍事实的证据发现,极可能潜在地预喻了构造主义和架构理论中象征互动理论、符号论、标签论对于人群社会行为构成的简单解释是颠覆性的。缺少对于人群在不同社会维度亚文化具体生活范式的理解,对于有着相似人口社会统计特征的人群中存在性实践不同群体差异的解释必然困惑。我们数据的启迪还在于,构成人群亚文化的社会因素是多维的和机缘性的,而同一维度中亚群体的构成方式也是多维的和机缘性的。四川雅安个体三轮车从业人员中大多是过去的城镇无业人员、下岗工人和外来农民,是历史、制度、阶层、身份和社会化的动态机缘性地将他们共同的结构在这个特定职业为背景的亚文化范式中。然而,这些有着相似的社会经济背景、生活经历、统一的从业着装、共同的社区语言,则不是必然使他们这些每日相见的职业人群处于同质的互动群体,而是事实上的多样化群体的构成,这就成为这个人群性实践差异的基础,而这种差异亦是他们不同的社区环境、活动的地缘位置、信息渠道、人际网络的机缘性构成,这种机缘性构成的多样化差异,则一直被以人口社会统计特征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理论所忽略。同样,对于成都市个体从业人群中存在着性病艾滋病易感性行为明显差异的发现,也挑战着流行病学和普通社会调查资料中关于易感人群共同社会背景特征的笼统看法,而成都男-男性关系人群中亚群体的广泛不同质性更是挑战了同伴教育人际互动、信息扩散的一般性策略,这些都显示了社会并不是简单笼统地编制了盖格农(Gagnon)和塞蒙(Simon)式的人类性实践的社会“脚本”,而是以人群每日生活具体人际交往的生动形态,以地域、信息渠道、角色、人际网络的机缘方式,演绎着一出性实践阶级、职业、阶层、身份、种族的亚文化社会生活史的“剧目”。

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性表达的现实与历史的社会架构中,我们看到了关于性的社会本质更为深入的维度。他在着眼于人类性实践更为宏观的社会历史结构的同时,特别包含了对于边缘人群社会架构中的制度、话语、知识、权力、身份、网络等变量的关注。福柯理论构架中从“压抑”的假设展开的有关人类性实践的历史的分

Sociological Findings of HIV in China

中国艾滋病社会学研究：理论、方法与政策

析,注意到了制度、阶级借助专家、权威、政客、媒体话语以弥散和网络的方式控制这些人们性取向和性表达的历史过程,进而产生了对于性特征和表达的现代社会在制度接纳、人文适宜和健康策略匮乏的强烈不满和激烈批判。福柯的分析发现,人体、欲念、身份及其行为的社会存所固有的人性价值,被世俗观念和制度理念基础上的医学、法学、精神病学、社会知识和传媒的话语权所控制。这就使多样化性取向的各种历史性的角色不得不传统地和制度性地划分进入社会边缘的人群,如病人、犯人、同性恋、男-男性关系人群等。福柯关于性实践及性健康和疾病的理解、建构和对待方式的阶级与制度话语的历史批判方法,在成为推动人类知识变革和人文发展的后现代结构主义兴起的主要思潮的同时,更是为众多社会边缘人群由制度和阶级的歧视带来的压抑开凿了一道光亮的窗口,因而是现代多元化和边缘人群肯定自身亚文化生活方式的一面旗帜。不过,福柯以及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布尔迪厄(P. Bourdieu)和德里达(J. Derrida)理论构架隐含的思想,更多是建构在文化批判和平等权益倡导意义上的。尽管福柯的思想有着对于大量陈旧笔记和历史档案文献分析的坚实基础以及广泛而由深刻个案事例灵活运用的杰出策略,然而,正是由于绕开和拒绝了人际互动理论中关于性实践的群体社会构成的概念,因而在他的“制度与话语的历史构成”的论断中我们难以辨析出性实践的群体结构和过程,尤其是福柯对于身体的使用——性及性表达——作为历史的、制度的范畴的深邃见地,如果在特定阶级、文化的具体人群形态中的呈现,恐怕会更加接近历史本身和更加生动。

在我们有关男-男性关系人群的艾滋病干预研究发现,他们中那些不确定自己为“同性恋”的人当中,由于经济地位和社会歧视的原因,虽然存在着更为隐藏的共同性的无保护被动式肛交性服务行为,然而,亚文化社会促进基础上的干预活动,则使这个人群比采用同伴教育的其他同性恋人群更为持续地从事着安全性实践。这个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了亚文化改变的群体行动过程,对于环境舆论的压力和单纯社会背景的构成因素的超越。这种亚文化群体中的艾滋病干预的实践过程可能预兆这样的社会学含义:即,人对于自身身体使用方式及这种使用方式的艾滋病易感(毒品静脉注射,地下血供,多性伴无保护性行为)既不是简单的社会建构,也不仅仅是知识、规范与传媒基础上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制定,而是在于具体的、直接的群体日常社区和历史活动现实本身。换句话说,构造主义、架构理论和后现代结构主义理论的种种变量似乎需要

艾滋病防治的社会学发现

通过具体的、多维的群体活动形态和变量以深化和推进。

正因为易感行为是社会环境的建构,社会学在理论上更强调对于根本扭转易感行为为社会结构的制度、经济与政策环境改变方法的寻求。很显然,宏观水平上的社会促进运动理念超出了我们课题研究项目可及的范围。小规模亚群体改变的研究相对于宏观社会的运动的确是微不足道。持久有效的干预确实有赖于制度和政策层面的根本性改变的工作。然而,发生在基层社区微观层面的亚文化运动恰恰是推动政策环境发展重要的社会潜移力量,这符合全球性微观社会权力体制转移与促进(Empowerment for civil pepole)的艾滋病预防的社区倡导策略。与此同时,亚文化作为读解群体社会存在和社会实践的概念应该说是一个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传统概念。然而,正是在应对艾滋病的易感行为及其行为改变的研究中,由于对它在整合社会的制度、阶层、历史、身份、角色多维度要素丰富意义的发现,使得我们在艾滋病社会学在行为改变的理论 and 实践中,有这样历史性的机会超越其他学科领域和自身的概念构架。尽管回顾这些工作仍然微感到不足道,但确系我们在近 10 年的工作中为抗击艾滋病流行贡献了中国社会学的努力。并且我相信,这些原创性工作及其包含的大量信息,无论对于过去 10 年,现在和今后来理解我们的社会,理解那些无辜遭受疾病流行打击的边缘脆弱人群命运的社会本质,毫无疑问,会有着极其重要的社会学价值。



王曙光 博士

Sociological Findings of HIV in China

目 录

导 言 Introduction 1

第一部分 行为评估:中国环境中艾滋病易感的多样性亚文化构成 1

Part I Situational Analysis on HIV Vulnerability in Subcultural Contexts
of PRC

1. 个体从业青年的亚文化环境易感 2

Subculture Vulnerability of to HIV among Self - Employed Young Men

1.1 背景 3

1.2 设计与方法 4

1.3 群体亚文化活动环境的参与 6

1.4 性行为的亚群体差异及其相关因素 7

1.5 亚文化参与因素的主导性影响作用 10

1.6 理论与干预实践意义 15

2. 不适当信息的亚群体构成 20

Subcultural Form of Unfavourable Message

2.1 背景 21

2.2 设计与方法 21

2.3 知识的准确性 22

2.4 信息来源 25

2.5 知识准确性的社会构成因素 26

2.6 理论与干预实践意义 27

3. 三轮车从业人员易感行为亚群体机缘结构动态 30

Opportunity Structure Dynamics of Subculture for HIV Vulnerability among Trishaw Drivers

3.1 背景 31

艾滋病的社会学发现

3.2 设计与方法 33

3.3 人口统计社会背景变量与亚文化机缘结构 36

3.4 信息、认知、态度的亚群体机缘结构 40

3.5 性实践的亚群体机缘结构 49

4. 男 - 男性关系人群易感行为亚文化社会维度 53

Socio - Subcultural Dimension of HIV - Related Vulnerability among MSM

4.1 背景 54

4.2 研究设计与方法 59

4.3 群体的多样性亚文化构成维度 61

4.4 信息构成的亚文化维度 67

4.5 性实践亚文化的多维度社会构成 71

5. 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相关信息的跨文化因素 78

Cross - Cultural Descriptor of HIV - Related Messages Among Minority Ethnic Groups

5.1 背景 79

5.2 研究设计与方法 80

5.3 不同文化群体构成的基线数据 81

5.4 知识准确性基本情况 83

5.5 影响信息构成的文化因素 83

第二部分 干预理论的鉴别解释 87

Part II A Critical Perspective on Social Theories in HIV Intervention

6. 行为改变理论概述 88

A Review on Behaviour Change Theories

6.1 性行为的社会、文化、历史建构 88

6.2 个体行为改变的心理学理论 91

6.3 亚文化改变的社会理论 93

6.4 结构 - 环境改变的社会理论 94

6.5 运用新的交流方法的社会理论 97

7. 行为改变的个体行为理论 102

Individual Perspective of Behaviour Change

Sociological Findings of HIV in China

- 7.1 健康信念模式(HBM) 103
- 7.2 社会认知-学习理论(SCT) 117
- 7.3 原因行动论(TRA) 125
- 8. 行为改变的社会群体环境理论 134
 - Social Contextual Perspective of Behaviour Change
 - 8.1 信息扩散理论(DM) 136
 - 8.2 亚文化群体改变的理论(SBC) 136
 - 8.3 同伴群体参与式教育模式(PPE) 141
 - 8.4 社会网络群体模式(TSN) 142
- 9. 行为的社会结构-环境改变理论 144
 - Social Structural -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of Behaviour Change
 - 9.1 社会运动模式(SMM) 145
 - 9.2 社会权益促进模式(SCE) 148
 - 9.3 健康促进的社会生态模式(SEM) 149
 - 9.4 行为改变的政策模式(PCB) 149
 - 9.5 社会结构模式(SSM) 150
 - 9.6 社会行动的模式(MSA) 150

第三部分 文化适宜干预策略的本土实践 153

Part III Indigenous Practices of Culturally Appropriate Strategies in Intervention

- 10. 安全角色行为模式: 三轮车从业人员安全行为的同伴教育研究 154
 - Safe Sexual Role Model: Peer - Based HIV Education among Self - Employed Trishaw Drivers
 - 英文概要 154
 - 10.1 背景 156
 - 10.2 课题设计与方法 158
 - 10.3 前测试: 基线数据 167
 - 10.4 干预实施 182
 - 10.5 “故事”传播的过程评估 188